张晓艳，李永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理论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5）：40-49.
Zhang Xiaoyan，Li Yongshuang. Regionalized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oretical connotations，generative logic，and practical pathway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5）：40-49.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5.005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理论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张晓艳，李永双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深刻理解“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与核心要义，对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城乡关系和社会共同体理论，传承发展了乡村协同互助的优良传统，直面乡村行政性壁垒制约和同质化竞争，体现出乡村发展“聚”“连”统一的组织形态与价值特征，彰显了分类施策与片区统筹的有机统一。以对“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理论内涵和生成逻辑的深刻理解为统领，探索了片区协同治理、培育富民产业、普惠公共服务、建设宜居环境的实践路径，旨在推动片区乡村协同共治、产业共育、共建共兴。

关键词：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理论内涵；生成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5-0040-1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1]。这一重要论述，突破了以“单一行政村”为发展单元的传统推进路径，强调将地域相邻、产业相近、资源互补的多个行政村整合为乡村片区，推动片区整体规划、资源整合和产业联动，形成发展合力，促进片区共兴，为“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方法指引和实践遵循。“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鲜明的实践驱动支撑与理论演化逻辑。2003年浙江省率先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全域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与示范建设，蕴含着重塑乡村空间关联、片区协同发展的早期探索。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通过搭建跨区域协同共治平台，形成了片区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这一战略部署，不仅锚定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方法，更指明了制度创新方向。“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回应了乡村人口外流、产业分散同质以及公共资源错配等现实挑战，精准对接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培育、资源要素共享及公共服务普惠等核心问题，既彰显了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论特征，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跃升。本文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厘清“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支撑、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三重维度，剖析“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并提出片区协同治理、产业集群共育、公共服务普惠、宜居环境建设的实践路径，为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收稿日期：2026-02-08 **修回日期：**2026-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学理化研究”（25BKS095）
作者简介：张晓艳，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

一、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

准确把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是深化实践探索、释放制度红利的基本前提。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对传统“以单一行政村为单元”模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的方法论要求与“片区统筹、资源整合”的空间组织形态的辩证统一，是打破单村行政边界、重构乡村发展空间单元的关键举措，其核心要义在于保持原有行政村集体经济产权独立的前提下[2]，以分类为前提、有序为节奏、片区为单元，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分类”强调差异化施策，依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产业特色，科学划分片区单元。“有序”强调合理把控推进节奏，依据不同片区的发展条件明确振兴优先序，推动优势村带动薄弱村协同发展。“片区化”强调在地理空间邻近、资源禀赋互补、产业关联紧密、文化民俗相通的基础上，将若干位置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联的“村”组成“片区”，以“片区”为“单元”，统一规划、统筹政策、整合资源，推动产业连片发展、环境连片整治、组织连片共建，以“强村”带动“弱村”实现共同发展，既呼应乡村发展中“协同互助”的优良传统，也契合新时代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现实需要，通过有效整合分散资源，构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空间单元，形成跨村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协同治理的紧密关联网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凸显了“聚”“连”的有机统一，“聚”是指聚合零散资源要素，集中化解单村资金不足、人才缺乏等难题，通过对资源要素的集约整合，提升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连”是指跨越村庄物理壁垒，连通片区水电路网气讯，连接特色产业，联动人才服务，畅通要素流动。“聚”与“连”的有机统一，既体现在产业层面的上下游联动、同质化整合与规模化经营，也表现为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人才资源的协同配置和公共服务的均衡覆盖[3]。

从组织形态看，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基层政府规划片区发展方向，以市场机制激活片区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发展活力，兼具行政引导的规范性与市场调节的灵活性[4]。从价值目标看，通过对乡村发展单元重构与推进策略优化，以产业集聚提升片区发展动能，以利益共享助力共同富裕，以连片整治推动生态宜居，以分类施策实现均衡发展，以整体开发实现片区文化和美与共[5]。在区域整合层面，以功能协同为导向，在尊重行政村历史延续性与发展主体性的基础上，强化跨村联动机制建设，实现行政整合与功能协同的有机统一[6]。在产业发展层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强调立足片区资源优势，以利益联结和合理分配为前提，通过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配套产业的分类布局和有序培育，强化片区资源整合、产业协同与利益共享。在协同发展层面，强调构建片区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组织共建和公共服务普惠的多元一体发展模式。在实践主体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分类引导、分层赋能推动不同主体在乡村振兴中各尽其责，凸显基层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村干部和农民的主体地位，构建政府引导与多元主体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共治格局。

综上所述，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立足于乡村发展的空间关联与要素互补，秉持鲜明的系统思维与协同逻辑，是以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多元主体参与为支撑，有序推动片区产业共育、设施共建、服务共享、生态共护的乡村振兴路径。这一路径，在保留原有行政村产权归属与治理边界的基础上，通过片区单元的科学划分与资源整合，推动乡村振兴从“分散发展”向“集群共进”转型，从“局部优”“单点强”向“整体优”“全域强”转变。本质上看，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一场涉及规划管理、组织建设、要素流动以及权益保障的制度变革，通过规划共绘、事务共商和协同共治，畅通村庄、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形成跨村发展共同体，实现片区村庄的优势互补、强弱共济与协同发展。

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在于通过治理单元的空间重构与治理机制的系统重塑，实现片区乡村振兴效能的整体提升。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理支撑、乡村协同互助发展的历史传承与跨村联动融合共建的现实需要，共同构成了片区化推进乡

村振兴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思想底色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城乡关系理论及社会共同体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性。这些经典理论为片区资源要素整合、利益关系调整、治理结构优化提供了学理依据和价值遵循，回答了乡村“为何振兴”“如何振兴”“为谁振兴”等本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明确了片区共建共享的价值导向，城乡关系理论提供了化解乡村资源约束的方法指引，社会共同体理论奠定了片区协同共建的社会关系基础。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下全体成员终将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共同享有，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核心价值遵循。马克思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7]。”“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8]。”恩格斯强调，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8]。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依托“强村带弱村”“核心村辐射”的协同发展路径，构建片区内股份合作分红、保底收益保障、就业优先扶持等多元化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差异化资源配置加快薄弱村庄发展，推动薄弱村集体经济增值，助力低收入农户获得工资性、财产性和经营性多元收益，保障薄弱村与低收入农户平等享有乡村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的增值收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阐释了城乡对立的生成根源、衍生后果与消解条件，指出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走向，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城乡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的最鲜明反映”[9]，指出最先进的国家应当“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10]，“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1]，这一理论涵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城乡发展权利平等、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等观点，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落地提供了支撑。一方面，以片区为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在尊重村域发展差异的基础上，跳出单一村庄的发展局限，推动片区村庄的协同发展和城镇要素资源向乡村流动，契合城乡关系从“对立分离”走向“融合共生”的演进规律。另一方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整合不同村庄的土地、资本、人才等要素，提升片区承接城市资源的能力，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准则的深度践行。

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论揭示了社会共同体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强调社会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10]，“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0]，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构筑了社会关系基础。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提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8]。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论强调社会是基于社会化生产的各方面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通过生产力普遍发展、社会关系重构与城乡融合共生，人类社会从自然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基于农业生产的优势互补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片区治理共同体，保障不同村庄在共同体中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论“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协同变革”[12]的精准回应。同时，马克思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平等地位的有机联合与协同行动，也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即通过吸纳跨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社会组织及村民等多元力量平等参与乡村共建共治，进而构建“党建引领、政府统筹、市场参与、村民主体”的治理格局。

（二）历史逻辑：乡村协同融合发展的实践传承

回溯我国乡村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协同”“融合”“互助”始终是核心特质，“分类施策、

有序推进”是党领导乡村建设一以贯之的重要方法。从传统乡土社会的农事互助、乡规共治，到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组织化实践，再到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协同发展呈现出从原生自发到自觉组织、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协同、从单村零散到片区统筹的演进特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既是对“协同”“融合”“互助”乡村发展内核的传承，也是乡村协同融合发展传统的当代转化，更是对党领导乡村建设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互助组织建设，为乡村协同发展从原生自发形态向自觉组织形态转型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一时期，根据地推行了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等互助组织[13]，建立了计工折工[14]、工票结算[14]、定期分红等管理机制[15]，明确了劳动报酬标准与资源调配机制，通过开展跨区域劳动力调剂、农具共享与生产协作，组织互助组参与支前运输与物资筹措，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临时互助与长年互助的民主管理流程。这些举措推动自发互助转化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既整合了分散的生产资源、强化了跨区域协同的组织化程度，也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和粮食产出率，化解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给难题，更积淀了跨村域统筹、资源集约化调配的组织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乡村建设的重心转向生产要素整合与治理单元重构，农业合作化推动临时互助走向集中统筹，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为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奠定了基础。在自愿互利原则基础上，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互助组通过换工劳动、劳动互助等形式，促进了农事生产的有效组织和互帮互助。合作社以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缓解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畜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实现了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和集体劳动[16]。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户、跨村统筹利用，而且增强了农民集体协作观念与民主参与意识，实现了乡村分散经营向集中协同的转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市场机制的引入推动乡村发展跨越行政边界，片区协同发展模式逐渐形成。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选取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的1万个行政村，按照“先示范、后推广”的节奏开展全面整治，打破了单一村庄治理的局限，推动了片区协同发展。“千万工程”以片区为基本单元，统筹人居环境整治与产业布局优化，构建起“县—乡—片—村”四级协同治理机制[17]，通过组织联建、规划衔接、资源共享、产业联动和治理共商，推进了乡村片区化、协同式发展。随后，江苏省、山东省等地积极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整合分散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推动土地资源向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18]，依托农业产业集群实现村域产业联动，推进村庄协同规划，规范乡村布局、用地管理和基础设施联建，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探索发展了跨村产业统筹协作、乡镇企业跨地联动和公共设施共建共享的模式[19]。这一时期的乡村发展，体现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鲜明特征，提升了规模经济效应，增强了市场竞争优势，强化了跨村联动、联结、联通，实现了片区资源的集约统筹利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深度调整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倒逼乡村治理单元从“单村封闭”向“片区开放”转型，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片区协同发展成果。山东荣成采取“跨村联建”方式，将多个村庄组团设立片区，统筹规划与建设，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优化配置[3]。广东清远整合村民小组组建片区治理单元，探索形成了“片区统筹＋村社自治”的协同治理模式[20]。江苏镇江借助合作联社整合多村产业资源，通过“联村共建＋利益共享”推动产业协同升级[21]。福建三明依托“跨村联建”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实现了党建引领与产业联动的有机统一[22]。各地聚焦跨村协同发展，积极探索“强村带弱村”“资源互联”“产业牵引”等片区化乡村振兴路径，完善了片区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机制，搭建起跨村村民理事会、乡贤联谊会等协同治理平台，提升了片区治理的系统性与协同性。新时代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传承了乡村协同互助发展的传统基因，构建了片区空间协同发展的制度基础，落实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要求，实现了

从“单村零散发展”到“片区联动发展”的跃升，奠定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

（三）现实逻辑：乡村统筹联动发展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同新时代乡村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推动了农业产业的现代化、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共同富裕。与此同时，乡村发展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行政壁垒造成的空间分割制约了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农业产业链条延伸不足和规模偏小，小农户难以对接现代大市场，亟需通过制度创新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集群跨村统筹。

第一，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化解单村发展资源约束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持续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促进了生产要素城乡流动，提升了资源配置市场化水平，缓解了“虹吸效应”引发的乡村资源困境。但是，乡村发展仍面临突出的空间协同治理短板，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依然严峻。广大村庄尤其是中西部村庄普遍面临土地细碎、资本匮乏、技术薄弱和人才流失等资源瓶颈[23]。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限制了村庄的要素配置，单一行政村受空间边界与治理单元限制，依靠“单打独斗”难以推进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提质，资源错配与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凸显。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以地域相邻性与资源互补性为基础，跨村整合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能够推动资源要素在片区的有序流动、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为缓解传统单村发展模式下的资源约束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规模化水平的现实需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凸显了农业产业对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作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业产业逐步向现代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农业发展成效显著。但是，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规模化经营不足；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不畅，抵御市场风险、应对产业竞争能力不够；农业产业加工局限于初级生产环节，产业核心竞争力薄弱等结构性矛盾突出，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加以解决。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立足片区整合产业资源，通过构建“主导产业引领、配套产业协同、服务体系统筹”的片区农业产业生态，能够推动农业产业从“点状分散”向“集群联动”转型，促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融合，推动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度协作，实现与现代大市场有效衔接，降低经营成本与市场风险，提升片区农业产业附加值与竞争力。

第三，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加强宜居环境建设、促进村庄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4]。我国乡村地域广袤，自然禀赋、发展基础、产业条件等区域差异明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村庄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宜居环境建设呈现不均衡态势，那些地理位置偏远、发展基础薄弱、资源禀赋缺乏的村庄，生态保护乏力、环境基础设施滞后，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乡村全面振兴是乡村全区域、村民全覆盖、内容全方位的振兴，需要促进村庄的有序均衡发展。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发挥片区内各类村庄的比较优势，构建“以强带弱、优势互补”的利益联结与协作机制，化解片区内宜居环境建设和村庄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实现片区内村庄的功能互济，促进资源富集村与资源匮乏村协同发展，形成村庄互促共荣、宜居宜业、协同共进的乡村均衡发展格局。

第四，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促进公共服务普惠供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乡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优质公共资源呈现向中心村集聚的特点，偏远村庄与小型村庄因人口规模有限、地理空间分散，难以享有便捷的公共服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集约高效、共建共享”为原

则，以片区为基本单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通过集中建设标准化设施，构建“中心村辐射、周边村共享”的网格化公共服务格局，既能够规避公共服务设施重复建设与资源闲置浪费问题，又能够提升偏远村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率，推动公共服务在片区内普惠共享。

三、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的纵深推进，以“单一行政村”为单元推进乡村振兴显现出资源碎片化配置、产业同质化竞争、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等问题。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能够通过空间单元优化与协同机制构建，强化片区村庄统筹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协同集群发展和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在推进过程中，需要科学把握片区特点，立足不同村庄的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畅通资源要素流动，强化资源互补与优势叠加，贯通空间统筹、产业赋能、服务普惠、生态宜居等建设任务，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向“片区提升”转型。

（一）推动片区空间协同治理

以单一行政村为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在此模式下，受行政边界刚性约束与资源规模限制，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难以跨村配置与有效整合，无法形成集聚发展合力。同时，围绕单一村庄分散化的治理与建设，缺乏跨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公共事务的协商共建机制，各村庄在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各自为战，制约了乡村产业的规模化与提质升级，限制了乡村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格局的形成，阻碍了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优化供给。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以地理毗邻和产业关联为原则，科学划分片区类型和空间治理单元，推动乡村资源整合与价值挖潜，提升片区发展的系统性与协同性。片区规划和空间治理的单元设定，应依据发展基础及资源禀赋特征，统筹资源互补性强、产业关联度高、利益联结紧密的行政村协同发展。

首先，坚持将“党管农村”工作方针贯穿片区乡村振兴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资源整合、凝聚共识与组织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引领力和组织力。基层党组织的强有力领导，推动片区协商共建机制和议事平台建设，优化跨村公共事务治理，促进片区规划共商、项目共建与风险联防联控，针对产业联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布局等跨村公共事务，积极开展跨村协调共商，明晰主体责任边界与协商议事流程，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片区的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其次，立足村庄资源禀赋，科学分类空间治理单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依据片区村庄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将片区划分为核心发展单元、特色产业单元、生态保护单元、文化振兴单元等功能类型，通过产业联动、设施共享、生态共护，强化单元间的协同互补，提升片区空间协同治理效能。核心发展单元重点发挥中心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特色产业单元重点建设现代农业及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生态保护单元推进片区村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文化振兴单元注重传承创新传统乡村文化，推动文旅有机融合。最后，以共建共享为导向，编制科学合理的一体化片区规划，完善片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要素跨村流动提供保障。片区规划应以国土空间“三区三线”管控政策为指导，在凸显片区主体功能基础上，既强化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刚性约束，也针对乡村产业融合及新业态培育，预留弹性用地指标，构建“县域—片区—村庄”的系统规划。基础设施不仅是物理形态上的工程设施，更是片区空间治理的物质基石和制度载体，决定着片区空间单元功能的落地效能。要持续推进跨村基础设施联通工程，提升片区基础设施的便捷性。在产业配套设施方面，聚焦农产品产销全链条需求，布局建设冷链仓储、电商物流、农产品加工设施，统筹供水供电、防洪排涝、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构建片区统一的数字服务平台，整合政务服务、农产品交易、农机调度等功能，推动数字技术与片区治理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提升片区治理的协同度。

（二）培育片区特色产业集群

单一行政村分散发展产业过程中，产业规划统筹不足、经营规模偏小、产业链条较短、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不畅等问题逐渐显现。有效化解

这些问题，应大力培育片区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市场化发展。培育片区特色产业集群的核心在于依托片区资源优势，将地域性生产要素转化为区域性竞争能力。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按照价值链整合、产业链延伸和利益链联结的思路，结合片区村庄发展的异质特征，将片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特色品牌优势和普惠富民优势，培育与村情农情相适配的特色产业集群。总体来说，可通过“党建引领”“强村带动”“园区融合”三种模式，分类推动片区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党建引领”模式以跨村党组织为纽带，通过联村片区党总支建设，强化党组织在产业规划编制、片区资源调配、利益矛盾协调的核心统筹功能。“强村带动”模式以“强村”的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为基点，整合生产与市场两类要素，引领“薄弱村”协同发展，建立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的特色产业集群。“园区融合”模式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通过“园区＋农户”利益联结，促进产业链延伸和就业创业空间拓展，助力农业产业走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现代化服务的发展路径，推动农业产业规模集聚与能级提升，增强片区产业发展韧性。

片区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应循序渐进、有序统筹，分阶段分重点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一要锚定具备市场潜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导产业，挖掘主导产业特质与乡土文化基因，整合政策扶持、资金融通、技术研发和人才引育等要素，构建从源头种养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依托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联动营销路径，提升主导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与品牌附加值。同时，建立主导产业动态监测机制，科学研判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态势，并及时对产业发展策略进行调整，确保主导产业始终保持发展活力。二要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在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态方面，引进先进加工设备与工艺，规范加工流程与质量标准，以此实现农业产业价值跃升。促进农业与文旅、康养产业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片区自然风光、农耕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等资源，打造农耕体验园、乡村民宿与康养度假村等特色消费业态，让农业产业潜藏的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充分激活。同时，搭建片区农产品电商平台，通过完善平台运营、物流配送以及售后保障等配套服务，拓宽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开设农产品加工、电商运营与文旅服务等相关专项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三要聚集乡村特色产业集群长效稳健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健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二次返利等利益联结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片区产业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围绕价值创造、利益分配、监督管理全链条，平衡投资企业、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的利益关系，规范开展土地经营权、林权和集体资产股权等要素的评估工作，明确产权边界与收益分配比例，完善纠纷调解机制，及时化解利益分歧，维护产业发展的正常秩序，促进利益分配流程与监管的公开公平公正。四要积极完善片区数字产业集群生态，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集群深度融合。搭建涉农物联网、农业大数据平台以及智慧物流等数字基础设施，推动5G、千兆光网全面覆盖片区产业发展领域，实现生产环境、作物生长及农机作业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与传输。建立片区产业数据产权、流通交易与收益分配制度，促进农业生产数据与农产品流通数据、乡村市场数据的共享与交易，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依托片区龙头企业与园区主体，培育产业数字链主企业，带动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入农业产业数字链条。

（三）优化片区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的均等供给是片区乡村振兴的民生根基，不仅能提升片区的整体福利水平，还能通过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普惠获得，提升低收入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其增收致富创造现实条件。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以行政村为单元规划公共服务，缺乏跨村统筹与协同联动，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与闲置浪费问题并存，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整体效率、供给质量和均等化水平。同时，受人口分布、村庄规模、公共服务半径等因素影响，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难以兼顾公平供给与运行效率，那些位置偏远的小规模行政村的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性偏低，亟需立足片区统筹布局，按照村庄类型和不同群体需求，差异化配置

公共服务资源，夯实片区公共服务民生基础。

首先，完善片区公共服务统筹制度。构建“片区统筹、分级负责、协同推进”的片区统筹制度体系，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规范化、制度化，以制度保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效能。一方面，要建立片区公共服务规划融合制度，结合片区内中心村、特色村、偏远村等不同村庄发展定位，将片区公共服务发展纳入县域公共服务整体规划，推动片区规划与县域规划深度衔接。另一方面，要健全片区公共服务资源统筹配置制度，建立公共服务资源跨村流动长效机制，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偏远村庄倾斜。其次，提升片区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供给质量。立足片区村庄人口规模、辐射半径和需求特征，有序推动公共服务片区均衡供给，优先满足基本性公共服务需求，逐步提升品质化服务水平。教育服务方面，依托“教联体”建设，推动优质师资、课程资源片区流动共享。医疗服务方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强片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改造和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推广远程诊断、巡回诊疗、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模式。养老服务方面，在中心村建设片区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专业设施与护理人员，为偏远村庄老人提供上门护理、健康监测、精神慰藉等服务。文化服务方面，整合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礼堂等现有资源，建设片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培育片区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再次，针对低收入群体、留守人员和特殊困难群众，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供给流程，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片区，加强养老服务供给、康复资源配置与照护体系建设；针对青壮年外流比例高的片区，强化留守儿童教育帮扶、妇女儿童权益维护与家庭支持服务；针对地理位置偏远的片区，推广流动服务和上门服务、强化数字化公共服务应用。通过分类施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最后，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以数字技术推动片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片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片区全域覆盖。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场景建设，搭建片区一体化公共服务数字平台。加强数字安全保障，完善片区公共服务数字平台安全管理机制，确保数字公共服务安全、稳定、有序。

（四）加强片区宜居环境建设

宜居环境建设是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民生工程，也是实现乡村生态价值、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支点。环境建设具有显著的跨区域、跨村落特征，污水处理、垃圾收运、道路绿化等环境治理均涉及跨村协调与多方联动，以单一行政村为单元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村庄交界区域及公共生态空间环境保护权责模糊、责任边界不清，难以实现环境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影响村际生态保护和宜居环境建设质量。进一步深化宜居环境建设，应秉持“保护与治理并重”原则，立足片区环境资源与生态底色，推动“生态保护—环境整治—价值转化”一体化发展，促进片区生态保护、环境整治和价值转化的有机统一。

生态保护是宜居环境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应从空间管控、产业转型与责任落实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夯实片区生态保护和宜居环境建设根基。首先，科学划定片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缓冲带与生态功能区，明确生态保护优先级与管控标准，严控不符合片区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活动，限制缓冲带内的开发建设强度和类型，构建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片区生态保护体系。其次，聚焦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体系，积极推广应用绿色耕作、生态养殖等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普及水肥一体化、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溯源管控，利用数字化监测手段，加强对污染源的精准定位和有效控制，打造资源循环高效、环境影响可控的片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再次，健全片区生态保护责任划分与考核评价机制，细化片区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及村民的生态保护权责清单，加大对各类主体环保投入、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减排成效的考核，促进生态保护效果与激励扶持政策挂钩，形成全员参与、全域管控、全程追责的片区生态保护责任制。最后，在尊重村庄自然风貌、历史文脉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片区统筹下的差异化施策，推动各类村庄既彰显优势，又在整体上形成功能互补、互促共荣的片区宜居环境建设格局：环境基础稳定的村庄，要突出村庄文化展示和业

态融合；环境基础薄弱的村庄，要优先补齐环境基础和基本生活条件短板；生态功能突出、生态敏感度较高的村庄，要坚守生态红线，以环境保护为前提谋产业发展，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

在此基础上，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围绕片区环境整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问题，积极推进片区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一方面，始终将村民的环境权益和环境诉求放在第一位，聚焦村容村貌提升重点任务，加强片区道路硬化绿化，分类推广适宜的卫生厕所，推进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治理，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推广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绿色能源，打造整洁有序、错落有致的片区空间形态。另一方面，促进生态环境资源与农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壮大绿色种养、生态旅游、生态康养、林下经济等生态友好型绿色农业产业，探索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升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水平，推动生态环境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共赢，绘就宜居宜业的乡村片区“富春山居图”。

四、结语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发展单元、资源配置方式和治理运行机制系统优化的乡村振兴推进路径，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乡村振兴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支撑，传承了协同互助、和衷共济的乡村优良传统，回应了以单一行政村为单元推进乡村振兴的资源约束、产业同质、服务低效等现实梗阻，提升了乡村振兴的统筹协调、协同共建与协作共兴，能够有效激活片区资源要素潜能、强化产业集群、提升公共服务质效，推动乡村更加全面、均衡、协调、有序发展。未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需坚持把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市场配置资源优势和农民主体作用有机统一，注重完善“县域—片区—村庄”三级协同规划机制，健全跨村要素流动、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机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片区单元统一规划、统筹资源、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集聚、治理协同和联村共富，实现更全面、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2] 田毅鹏．联村发展：乡村振兴推进的新趋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5）：32-38．

[3] 高强，张海为．县域城乡融合背景下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模式比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17．

[4] 郭晋萍，曹斌．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基于甘肃C地和山西J地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5）：129-135．

[5] 魏后凯．科学理解和把握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25（12）：3-6．

[6] 田毅鹏，张笑菡．村落社会“重层结构”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4)：76-84．

[7]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89，298，307．

[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

[1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11]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谢忠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

[14]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511，513．

[15]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江苏省革命根据地合作社史料选编[G]．南京：内部编印，1988．

[16] 邢乐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与理论[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2(6)：108-114．

[17] 屠霁霞．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1，29

(1)：42-48.
[18] 彭海红．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基本经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8（10)：107-118.
[19] 吴春宝．规划下乡：改革开放以来村庄规划的发展脉络及其实现逻辑[J]．探索，2023（4)：64-75.
[20] 唐鸣．从试点看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对国家层面24个试点单位调研的报告[J]．中国农村观察，2020（1)：2-16.
[21] 黄曼，庄晋财．合作联社、产业跃迁与乡村共同富裕——江苏省丁庄村的案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47-57.
[22] 陈晓宏．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模式创新——以福建省三明市“跨村联建”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2)：46-53.
[23] 魏后凯，吴广昊．中国村庄分化的成因与破解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28(6)：91-103.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Regionalized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Zhang Xiaoyan, Li Yongshu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cor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ized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rucial for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concept is rooted in Marxist theories of common prosperity,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ommunity.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commendable tradition of rural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directly addresses the constraints posed by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in rural areas, and embodies an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value characteristics that integrate "Aggregation" and "Connec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It emphasizes the organic unity of category-specific policies and integrated regional planning. Guided by a thorough comprehens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regionalized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approach investigates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wealth-generating industries, the provision of inclusive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creation of livable environments, with the objective of fostering coordinated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industry cultivation, and joint construction and prosperity in regional rural areas.

Keywords: Regionalized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Generative logic; Practical pathways